

哪个东方才是红的？

毛主义在苏联及东欧的存在（1956-1980）

〔美〕安德鲁·M·斯密斯（Andrew M. Smith） 著

道格拉斯·雷诺兹 指导

（2017 年）

红砖厂青年报 VOY 组织翻译

（摘要）《哪个东方才是红的？》是对中苏分裂之后在苏东地区出现的、鲜为人知的“反修正主义”思潮的研究，尤其是对那些自称为毛主义者的人的研究。这个研究主要集中于 1960 年代席卷苏东地区的“毛主义之风”，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球掀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风暴。它也讨论了文革对社会主义第二世界的外交影响。最后，本文挑战了对苏东集团马克思主义内部异议的主流学术研究，后者代表了苏东集团内部异议研究错误的两种人：那些拥抱了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克里姆林宫官方版本马列主义的人。简而言之，关于冷战时期苏东阵营内部异议运动的新研究必须将毛主义者——共产主义反对者包括在内。

目录

毛主义在苏联及东欧的存在（1956-1980）	1
引言	2
第一章 不易的联盟	7
第二章 去斯大林化和中苏决裂的开始	11
第三章 异端思想者（Inakomisl Yashchii）：苏联境内反修共产主义者	14
第四章 战友：中国和阿爾巴尼亞	37

第五章：保加利亚的喧嚣：1965 年的政变企图和 1968 年的世界青年学生节	42
第六章 变成“中国人”：毛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47
第七章 被审判的毛：卡达尔时代的匈牙利毛主义学生	54
第八章 卡齐米日·米雅尔不寻常的一生：波兰毛主义者在 1960 至 1970 年间	61
结论：对历史和东欧马克思主义单一的神话的质疑	67

引言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 年 8 月 14 日

从 1950 年代晚期到 1970 年代中期，毛泽东的理论鼓舞了很多年轻人——年轻人、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去给世界现行秩序制造“麻烦”。当时，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非殖民化以及超越美苏冷战的新视野的旋风。紧随着苏联首脑尼基塔·赫鲁晓夫在 1956 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

会上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的攻击，国际共运在欧亚两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遭遇了戏剧性的分裂——全世界的共产党均分裂为了支持苏联及东欧的一派与支持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一派。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苏联的）政治权威，以及对战胜资本主义和进入共产主义的革命实践似乎岌岌可危。中国和她的阿尔巴尼亚盟友似乎在斗争中被孤立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社会主义力量，但是却可以看见中苏决裂^[1]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倒向了苏联，而北越和朝鲜政府则在两边摇摆不定。

如果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党反对毛和中共正在取得的新地位，那么这种事情不能解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更广泛进行。事实上，横跨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分裂为了互相对立的亲莫斯科的党与亲北京的“毛主义”党，双方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继承人。世界上左翼政党的数量突然就翻倍了，而新的毛主义组织往往会在名字的最后加上“（马列主义）”的称谓。这些毛主义组织往往在开始时规模较小，而在“全球六十年代”渐渐壮大起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许多社会中的学生和青年运动组织都觉得毛主义的要旨很有吸引力：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对他们老一辈的修正主义造反的、改良主义的和对亲莫斯科的威权政党的替代方案。例如，美国的黑豹党和革命联盟（即后来的美革共）、法国的无产阶级左派；还有非洲的反殖民起义，如安哥拉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津巴布韦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NU）都挥舞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戴着无处不在的毛主席像章等打破旧习的象征。

现代历史话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探究毛是如何成为横跨第一与第三世界的反修正共产主义的鼓舞者的，但似乎存在着一个缺口：第二世界呢？除去阿尔巴尼亚，东欧没有毛主义吗？我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对甚至是处于主流话语边缘的关于六十年代的毛主义的英文资料仔细检查显示它是存在的。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使我们能够接触全世界的新资源（特别是新解密的档案），也能够像联系到相关领域的学者一样通过网络联系到当年斗争中的老战士。这个研究当然是不容易的，幸好，我个人多年的对苏联历史和毛主义理论的研究帮助我完成了研究。由于俄罗斯政府只是偶尔缓慢地泄露其资料来源，所以苏联的档案大部分仍无法查阅。而对于这个研究所涉及的其他国家，要不是我与他们内部的毛主义组织的接触，（这些国家的研究）也是无法完成的。

目前的研究遗漏了中苏决裂以及它对东欧知识分子世界的影响，认为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与异见思想整体上要么亲苏联，要么亲西方。本研究是对这一话语的挑战。为什么苏东集团会被排除在全球 60 年代的思潮之外呢？尽管这些国家拥有大量的警察以及监控设施（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史塔西到苏联的克格勃），使得组建新的共产党或激进组织异常困难。但他们确实没能阻止中国的“东风”，就像他们也没能阻止通过他们与全球相连的社会与文化——来自美国领导的第一世界的“西风”一样。那些因持左翼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而被（苏东集团）官方定罪的不同政见者以及那些被湮没的声音，应当作为新的对第二世界、全球 60 年代及冷战的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而重见天日。这篇研究的结构与方法论按年代划分，从展示 1949 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结盟开始。

接着，它进入了对中苏决裂的叙述，以及北京与莫斯科在解释马克思主义上的分歧，或者说“修正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冲突。^[2]之后的每一个章节都讨论了与苏东阵营的毛主义有关的人和事。通过一个讨论苏联案例的关键章节，研究总结了更长、更全面的解释来让我的研究挑战历史研究者们，并且呼吁改变我们看待东欧漫长的 60 年代的方式。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研究明显遗漏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这些国家中确实有一小群年轻人致力于对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赠送的《毛主席语录》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翻译的简短尝试，但他们的尝试是如此简短且缺乏成就，以至于做出任何关于南斯拉夫毛主义的显著结论都是无意义的。^[3]而中国和罗马尼亚维持着不温不火的友好外交关系，我没有在任何有关中罗关系的学术文件中找到任何罗马尼亚公民把毛主义带回他们祖国的证据。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也完全相同。希望未来的关于苏东共产主义异议者的研究可以发现任何在 1960 到 1970 年代试图将毛主义带到这些国家的尝试。我的主要研究使用了很多同时代的期刊、手册以及其他文献。它们补充了学术资源，特别是对中苏决裂及文革的专题研究。其他学者的报告记录了他们在国家档案中的发现及关于不同国家中的（毛主义）运动的论文的汇编。它们对我来说都极有价值的。事实上，通过社交媒体和公共论坛与学者和活动人士建立联系，极大地有助于我对研究材料和活动家回忆的收集，否则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的。

^[1] 在大多数文献中，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和意识形态分裂被称为“中苏决裂”。(北京：外语出版社，1965)，4：428。

^[2] 术语“毛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反修正主义”是本研究中的关键术语，它们经常重叠或似乎互换使用：然而，它们本身是不同的术语。今天，“毛泽东思想”最常见的称谓被认为是“毛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及其国际盟友认为，毛泽东的理论不一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新的、更高阶段，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族解放斗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文化革命的历史舞台上的应用。直到毛去世后，幸存下来的亲北京党才宣布“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三个普遍适用的阶段。“反修正主义”一词是所有拒绝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的共产主义思想流派的总称，并认为苏东集团从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中“修正”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他们的国际盟友在与莫斯科认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进行对比时，称自己为“反修正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1世纪，毛主义者称自己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而亲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主义者继续称自己为“反修正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3] Dominique Kirchner Reill, “Partisan legacies and anti-imperialist ambitions: the Little Red Book in Italy and Yugoslavia, ” Alexander J. Cook ed.,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97-204.

第一章 不易的联盟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甚至在他自己的革命之前，列宁就目睹了一场革命风暴在亚洲达到高潮。当他谈论到在 1911-1912 年推翻了清王朝并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和国的辛亥革命时，他明确表示：“中国是一片见证了充满活力的社会运动和民主高涨的土地。”同时横跨亚洲的反殖民主义和左倾民主运动同一战中欧洲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运动一样，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的新发展。^[1]随着俄国革命后共产国际的发展以及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苏联现在与中国的政治轨迹利益攸关。为了协助发动全球革命的渴望，莫斯科指派了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到中国帮助新生的中共通过斗争转变为拥有群众基础以夺取政权的党。^[2]然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共产党建议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采取一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不同的独特路线。考虑到党小而散的特点，以及分裂的军阀仍然在中国肆虐，苏联建议中共与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这个安排被称为 1923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它创造了一股使得共产党与国民党获得独特而密切的共生关系的政治动力。同时加入两党几乎成为了共产党员几乎必要的条件，而共产党也能把他们杰出的干部派往国民党高层。他们(共产国际)不仅期望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盟统一中国，而且也想把国民党自身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事实上，苏联人一直对国民党最终加入共产国际的可能存在兴趣）^[3]

当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想当然地把国共第一次合作视为一个壮大他们的党的绝佳机会时，应该注意地是这个行为其实是半自愿的。理论上来说共产国际扮演了全球共产党的国际议会的角色，各方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全面的自决权。但事实上，苏共不言而喻地拥有对所有事务的最终决定权，甚至是全球层面上的。而在 1930 年代，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本质上变为了保卫新兴社会主义世界的核心的苏联^[4]。甚至在列宁还在担任苏联领袖的时期，任何偏离共产国际的蓝图（的行为）对中共来说都极度困难，除非它不是前者完全禁止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努力在一开始是成功的。它为国民党打造了国民革命军(NRA)，它有能力把共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联合到使中国摆脱军阀割据的困境的战斗中。在 1926 年，国民革命军发动了成功的北伐，消灭了东部的军阀并把他们置于蒋介石松散的“党国”支配之下。国共合作的蜜月期结束了。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厌倦了共产主义者试图把国民党拉向左翼的尝试。在北伐半途中，他解除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并在 1927 年 4 月 27 日利用忠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发动了针对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大屠杀，这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持续到 1949 年的起义。^[5]在军阀们在北伐中遭受到巨大挫败的同时，中共严格遵守了莫斯科的命令，克制自己，不要寻求独立于国民党的道路，最终导致了血腥的悲剧。苏联很快谴责了蒋介石（尽管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断交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6]，而中国共产党转移到农村开始了革命的“人民战争”。莫斯科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爆发的共产主义革命欣喜若狂，即使它的发起方式与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相悖。不幸的是，由于中共缺乏与苏联边界接壤的领土，苏联没有办

法支援武器、资金或者额外的共产国际代理人给新生的革命。据 1938 年埃德加·斯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报告《红星照耀中国》所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用着比中国现代史中的任何军队都少的外国援助在战斗”^[7]1941 年 6 月，德意志帝国向苏联发起竭尽全力的进攻。而日本人还没有和苏联开战且忙于中国和满洲的战斗中。日本仍然是轴心国的一部分并且是莫斯科的间接敌人。横跨欧洲与中国，莫斯科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道义和顾问支持。后者在 1937 年与国民党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与共产党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将日本人驱逐出中国。在 1945 年 8 月，战争结束的几周前，苏联红军突袭并解放了满洲和日占朝鲜的北半边。随着日本遭到了两颗核弹的打击，失去了满洲，以及日本在中国的军队的被摧毁，日本向同盟国投降。

第二次国共合作几乎立即就破裂了。内战一直持续到人民解放军在 1949 年获胜。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现在是中国毋庸置疑的领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紧随其后，在 1949 年 12 月及 1950 年 1 月，毛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和其他的苏共领导人。斯大林祝贺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胜利。在毛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中国人与苏联人达成了协议，允许苏联向中国全境派遣经济顾问来帮助中国革命后的重建。谈判随着《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署而结束。^[8]然而，解放后的中苏关系仍然是紧张的，当斯大林因毛违背莫斯科的指示对日本和国民党斗争所获的胜利所触动时，一股怨念依然存在。斯大林一直试图控制毛泽东从而维持他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地位。共产国际已经在

1943 年解散了,但是苏联仍然把自己视为社会主义阵营无可争议的领袖及战后社会主义秩序的缔造者。^[9]当朝鲜战争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爆发时,因担心南朝鲜首尔政府统一朝鲜而成为美国攻击中国的跳板,中共无条件地团结在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身边。^[10]中苏同盟,这个非常脆弱的同盟,在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后,即同年 7 月 27 日南北朝鲜停战前就开始破裂了。

注释:

^[1] 列宁, 《亚洲的觉醒》(1913 年 5 月)(原文为: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

^[2] Alexander V. Pantsov and Steph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2), 100106.

^[3] 同上, 151-155.

^[4] David Priestland, *The Red Flag: A History of Commun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2010), 124

^[5] Pantsov and Levine, 178.

^[6] 同上, 190.

^[7]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

^[8] Pantsov and Levine, 367-373.

^[9] 同上, 371.

^[10] Zhou Bangning, "Explaining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War in 1950, "Interst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014/2015, no.1, (2015): 1, <http://www.inquiriesjournal.com/articles/1069/2/explaining-chinas-intervention-in-the-korean-war-in-1950>

第二章 去斯大林化和中苏决裂的开始

“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1953 年，社会主义阵营尽管失去了斯大林，但仍然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信心，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经历了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协助西方盟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击败轴心国，在东欧建立起一片与共产主义结盟的“人民民主”^[1]体系，在朝鲜一定程度上击败了西方的军队。苏联在 1949 年研制出了自己的原子弹，向资本主义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世界不会在另一场全球战争(从而引发冷战)中感到无助。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在他们众多的演讲中都宣传资本主义已经处于暮年，即将到来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

然而，东欧集团内部充斥着紧张氛围，苏联正经历一场围绕谁将接替斯大林的激烈权力斗争，这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崛起而告终。赫鲁晓夫是一名曾因在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担任政治委员而获得苏联英雄奖项政治局委员。^[2] 1956 年 2 月 14 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他的第一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也是党自从成立以来的第二十次大会。在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清洗和独裁统治方式进行了严厉谴责。赫鲁晓夫所谓的秘密报告开启了去斯大林化的开端，这瓦解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包括将他的遗体从列宁陵墓移走，拆除他的几乎所有雕像，并停止出版他的著作。

同年 10 月，匈牙利爆发了反对苏联支持的政府的起义，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和紧张，赫鲁晓夫立刻要求苏联军队残酷地镇压匈牙利的革命武装^[3]，中国官方谴责匈牙利的革命，但私下里却对其后果犹豫不决，毛公开说：“(1956 年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4]然而，一开始，甚至是后来，北京都对苏联干涉这些事务并压制他们社会主义兄弟的自我决定感到不安。^[5]

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6]的谴责和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之后，毛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面前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7]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发展轨迹的担忧越来越明显。

注：

^[1] “人民民主”一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被用来指国内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被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后由苏联红军在外部帮助建立起其共产党的东欧国家。这一术语指的是当“工人和农民”在莫斯科的帮助下掌管政府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在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中扎根，推迟了这些社会向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转变。

^[2]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3), 168.

^[3] 此处有误。1956 年 10 月，匈牙利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如纳吉）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组织发动叛乱，纳吉窃取总理职务，公开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解散人民军队，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11 月，匈牙利人民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平息叛乱。——译注

^[4] 原文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5] Lorenz M. Lu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58-62.

^[6] 资产阶级及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用于攻击污蔑斯大林，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斯大林击败了如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斗争捍卫和发展了列宁主义。他所做的贡献是列宁主义的一部分。——译注

^[7] 原文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第三章 异端思想者（Inakomisl Yashchii）： 苏联境内反修共产主义者

“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

然而，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不仅引起了北京的担忧。相当一部分的苏联人——他们从小就将斯大林尊崇为从纳粹暴政中拯救国家的父亲般的伟大人物，此时也感到困惑：怎么一个那么受尊崇的人——即便有时候也令人畏惧——会如此突然被剥夺了一切神圣光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发生了小规模抗议集会，不过没有出现大的骚乱。^[2]然而，在一个特殊的例子中，困惑和轻蔑转换为了愤怒，在1956年3月初，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了普通苏联群众反对早期阶段“去斯大林化”的风暴中心。

1956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三周年，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主广场，听说当局将在近期内拆除广场上的斯大林塑像，上千人将花圈、鲜花摆放在塑像脚下。然而，在前一夜，骚乱已经开始了：根据格鲁吉亚苏维埃的特别报告和内务部的信件，当晚一群人聚集在斯大林雕像前缅怀他，一名年轻的大学生试图刺伤一名苏联军官，因为他没有在斯大林的雕像周围设立仪仗队。^[3]第二天早上，有50000人——主要是共青团员和学生来到斯大林广场纪念这位“人民慈父”，而且有150-200人躺在塑像脚下。^[4]在3月7日，大学和工厂罢工使示威人数增长到超过70000名工人、学生和党员。^[5]就在同一天晚上，戈里（斯大林故乡）、

苏呼米、巴统市爆发骚乱。^[6]显然，格鲁吉亚苏维埃人民不愿意束手就擒而听任他们敬爱的领袖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格鲁吉亚的共产党领导层这时似乎不知所措，成千上万群众组成的斯大林主义运动的旋风在他们门前盘旋，然而他们也不敢违背莫斯科。^[7]令他们更加紧张的是，一直期待能够到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朝圣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由朱德带领下到来了。^[8]与此同时，中苏军事峰会的国际影响已经对他们构成了足够的压力，而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后来目睹了此峰会在地方层面的影响，以及中国和苏联公民在反修正主义意识形态交流中会面的第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但对共和国领导层来说，距离最糟糕的事情只差两天就要来了。

在3月8日的抗议中，有数万人——可能接近10万人——一整天占领着广场。某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西里·姆扎瓦纳泽出来向群众讲话并承诺保卫斯大林。然而，群众要求朱德讲话。^[9]据现场目击者，作家法娜·巴佐娃（Faina Barzova）描述，一些人甚至特别要求姆扎瓦纳泽去“支持毛泽东恢复斯大林遗产和荣誉的努力”^[10]。据学者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的说法，“在共和国领导的请求下，朱德向示威者致意两次^[11]，但是人群还是没有散开……据格鲁吉亚内务部信息，有5名学生同朱德当面交谈，但是并没有说服朱德去参观第比利斯的斯大林纪念馆。然而，中国代表团内的某个人，确实在会议上讲话了。”^[12]

在中国代表讲话后，随着示威者高喊支持斯大林的口号，并在市中心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横幅，他们和当地民兵的冲突爆发了^[13]。随着冲

突的加剧恶化，抗议活动和平的迹象在晚上慢慢消失了。最终，在第二天早上，爆发的时刻到了：工人和学生聚集在一起，猛烈冲击交通部大楼。意识到一场全面的叛乱即将到来，苏联军队在高加索地区的防御区，即外高加索军区，被调往第比利斯。^[14]

军队甫一到来，悲剧就产生了。随着骚乱演变成有组织的叛乱，坦克出现在斯大林纪念馆周围并向人群开火，众多抗议者当即死亡。尽管仍不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因为抗议者也持有手枪和步枪，但军队最开始对骚乱的反应是各有不同的。在格鲁吉亚历史上广为人知的3月9日屠杀，最终以大约100-800人死亡结束（根据之后俄罗斯的原始资料）。^[15]

在3月10日，抗议最后一天，示威者大都四散各处、疲惫不堪，在第比利斯和戈里有零星骚乱，但立即遭到了苏军的镇压。到黎明时分，赫鲁晓夫时期规模最大的斯大林主义者——如果不是通常反政府意义上最大的——起义被彻底粉碎了。工人、学生和一般党员退回到他们正常的生活当中去了，虽然骚乱引发了全国性的压力，^[16]但几天内苏维埃格鲁吉亚的生活还是恢复了正常。

关于三月的暴动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机，有一点很重要：并非所有的示威者都是斯大林主义者，更不用说毛主义者。许多格鲁吉亚人仅仅因为把赫鲁晓夫看作一个忽视了非俄罗斯族苏联人民的需求的无能的领导人而反对他。对一些人来说，这仅仅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问题——虽然只有少数人是公开明确的反共主义者，但一些抗议者开始呼吁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联。^[17]这种杂糅的折衷主义，即

反对苏联新秩序的形形色色的动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有组织反修正主义各种表现形式的特征。

尽管一些抗议者向中国求助，但中国人并没有对这次起义发表回应。甚至在一次集会上向人群致意、并让其一位下属公开讲话的朱德，在这件事上也完全保持沉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实在不足为奇。这更可能是一场赌博，最有可能的是，可以打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苏联人民发起的反对苏联政权的亲中国起义并没有出现在北京的牌桌上。总的来说，中苏决裂才刚刚显露：事实上，两个国家都还在决裂的过程中，而双方都希望避免完全的决裂。

尽管在赫鲁晓夫时代剩余的时间内仍有骚乱（虽然广泛程度和暴力程度都小得多），赫鲁晓夫在苏共领导层内愈加不受欢迎，但苏联的中心位置依然稳固地保持着，苏联希望在后斯大林时代向外创建自己的世界地位。冷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社会主义阵营边缘国家已经出现裂隙，莫斯科当局对此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在第比利斯骚乱的同一年，苏联入侵匈牙利，这引起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注，甚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也是如此。然而正如之前所述，苏联为了全球霸权有一个更大的扩张计划，并且会继续执行让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越来越不安的外交政策。赫鲁晓夫开始插足第三世界，准备把新独立国家和反殖民运动纳入苏联的轨道。苏联彻底抛弃了经典的列宁主义观念——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而转向“和平共处”的新政策。莫斯科不再鼓动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向这些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并提供顾问支持，以求取这些国家政

府的支持，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以及待在苏联阵营的好处。莫斯科也将“和平”，而不是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对外宣传方式，以在面对“战争贩子”的西方帝国主义力量时获取国际威望。^[18]

似乎一些苏联公民对此以及中苏之间的日益分裂感到困惑。苏联共产党地方支部记录有市民和地方官员发出如这样的疑问：“难道我们不是事实上同帝国主义在西柏林问题上妥协了吗？”，以及“为什么苏联给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印度、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却不再给中国援助？”^[19]这是引人注目的，因为这些问题措辞和说法都表明提问者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对苏共同列宁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产生分歧表达担忧。他们正是那种可能偏离苏共党的路线，并接受反修主义思想的人。

赫鲁晓夫在 1964 年 10 月被赶下台，党的领导权转移到作为总书记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作为总理（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也曾经同样担任此职位）的阿列克谢·柯西金的手上。在此时，随着中国宣称苏联是“修正主义者”、“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中苏决裂已变得不可调和。中国称苏联已经成为同美国和西欧一样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敌人。^[20]与此相一致的是两个理论思想的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和勃列日涅夫主义——前者意为只有符合莫斯科政治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勃列日涅夫主义为苏联干预任何违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华约国家开启先例。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首次体现是在新总书记上台三年后，作为对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报复，勃列日涅夫迅速而野蛮地入侵了捷克斯

洛伐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立即谴责了这次入侵，并将这次入侵作为苏联帝国主义侵略者本性的证据，这得到了全世界亲北京党的响应。^[21]

相比之下，绝大多数苏联公民（以及亲莫斯科政党）或消极支持，或对勃列日涅夫主义保持沉默。除了在 1968 年 8 月 25 发生在红场的一个小事件，有 7 名抗议者因直言反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逮捕。

这是否表明苏联民众中的绝大部分已经遵循苏共的总体路线？当然不是，把生活在严格控制社会下的群体看作要么是思想完全同官方一致，要么全是隐蔽的持异见者，都是不理智的看法。苏联境内有超过 100 个民族，他们的每一代人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战后、后去斯大林化的一代人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经历，他们经历了国家逐渐停滞的重建和重组——这种混合的状态可能使局势剧烈激化并在这一代人中间产生不满。为了理解这是如何发展至此的，我们必须回顾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的社会和经济改革。

在《苏联青年文化》（Soviet Youth Culture）汇编中，坦尼娅·弗里斯比（Tanya Frisby）写到，在赫鲁晓夫执政末期，“大多数年轻人急切渴望在政治自由化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总体上来说，许多年轻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倾向于期望从领导层得到更多，因为此时他们都还坚定地信仰着社会主义……因此，赫鲁晓夫倒台后的政治发展，必须从年轻人理想主义的毁灭和幻灭来看待。先前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经验向年轻人展现了实现真正的社会政治意识的可能性，当 20 世纪 60 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治下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时，许多年轻人加入异见者团体。”^[22]

当然，“持异见”和“造反”是一种浮动的态度。对于大部分苏联年轻人而言，对党组织和共青团的强烈依附并不特别普遍，但对整个制度本身的强烈反对也不是特别普遍。当然，在 1965 年有超过两千万年轻人是共青团员——18-29 岁人口的 65%。^[23]事实上，共青团员身份几乎是进入大学的必要条件，但共青团也是青年人会面、社交的主要场所，被看作是一个“培养勤奋、纪律和无私品质的场所”。

而且，苏联年轻人总是对共青团领导层和团内积极分子保持相当的尊崇。许多人是“**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批评团领导为“虚伪的说教者和无所顾忌的野心家”。苏联文化中有一种被称为 *svoi*^[24] 的社会结构，字面意思是“我们”或“我们的”：*svoi* 是一种社会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中，年轻人并不积极表达异议，甚至在私下里也不反对政权；但也并没有强烈热情成为共青团积极分子或立志成为党员，因为他们知道国家领导层强加于社会各方面的“剧本”（即意识形态范式）总体上是毫无意义的，可以同样由领导人和公民来复述。^[25]只要你遵循“剧本”并参与苏联社会各种仪式（孩童时期加入先锋队，参加五一和十月革命纪念游行等等），消极的异议是被允许的，或至少是可以被忽视的。^[26]非常有趣的对比是，此时他们的中国同龄人正怀着真诚的热情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去，这些作为红卫兵的中国年轻人愿意做一切事情并贡献自己每一秒清醒的时间来使自己国家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1965 年是苏联的一个分水岭：中国还有一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柯西金总理主持着对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和苏联经济路线的彻底改革。这些变动之前赫鲁晓夫已经部分的在经济学家中解放思想和表达，

并且在一些地区已经实施了分权，^[27]而 1965 年 9 月的“柯西金改革”将其往前更进一步，并开始在整个联盟内实施分权。

加拿大经济学家简·亚当在她的专题论文《1960 年代起的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Economic Reform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the 1960*）中这样简洁的描述了苏联的新经济（苏联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同样遵循这个一般模型）：

利润生产试点一开始只限定在几个部门——尤其是服装业和轻工业，而到 1968 年，72% 的苏联企业都被要求在一定限度内进行利润生产。虽然企业仍然不能自由决定生产内容以及在哪里购买和销售，但是 1965 年的改革通过扩大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在计划、激励、就业、利润和投资等决策方面给予了企业管理者余地。而且，当苏联计划人员同意把盈利能力计算同投资资本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把意识形态完全地放在了一边。^[28]

亚当指出，根据指导方案，利润率同雇佣资本相关（固定的或流动的）。所谓的生产价格被应用到所有部门和集团的产品中。利润按生产成本在个别产品之间进行分配。放松了对于投资的国家规定，并且指导不同企业的党（行政部门）被鼓励参与自主投资企业的投机活动。利润成了一切的目标，控制着整个经济，实现世界革命和无阶级社会不再被关心。^[29]

然而，直到 1969 年，党内的“保守”（柯西金所言）趋势依然存在。保守势力尽管很微小，但也会偶尔攻击推进市场社会主义的“右派机会主义理论家”。利润作为经济的主要调节器，经常受到这些“保守派”的

谴责，声称这样的计划模式本质上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30]这些批评非常有趣，因为他们好像是同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对苏联经济批评的迎合。然而这些声音从未严肃地反对或与建制派分道扬镳，相反，随着经济停滞（Era of Stagnation）的时代到来——一场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经济冻结，他们让自己重新被吸收回到了党里面。

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外交人员也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批评和反对苏联共产党的路线。1966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传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驻各国使馆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在苏东阵营内的大使馆也不例外。^[31]在毛主义理论中，这些大使馆可能被看做世界革命的基地，就像在中国内战时期的游击根据地一样。尽管在对敌战场后几千公里处，大使馆人员仍被看作“造反派”，有着在向苏联境内推进文化大革命，反对修正主义的义务。

这些命令最引人注目的付诸实践是在三个月后，即 1967 年 1 月 25 日。前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马继森在她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中写下这样的故事，65 名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学生在红场上游行，带着巨大的花圈走向列宁墓。他们加入每天来看列宁遗体的人的长队，而一到达列宁遗体旁，都静穆肃立。当一名卫兵要求他们离开时，他们打开红宝书并开始大声朗诵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和列宁与斯大林对中国人民友谊的选段。当被逐出陵墓后，中国留学生和外交部工作人员跑回红场高唱“国际歌”，警察冲向了他们。他们高呼“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列宁主义万岁！”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莫斯科市民惊恐地看着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冲突。每一个中国学生和使馆工作

人员都毫无例外地被警察攻击，而所有学生都被火车送回中国。在北京，他们被热烈欢迎回到祖国，并且有上百万人在北京的莫斯科大使馆前游行。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没有再进一步去引起更严重的麻烦。 [32]

在第比利斯之后，由苏联公民自己创建反修正主义马列主义政党的最著名尝试发生在 1964 年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党总部位于哈尔科夫地区的小工业城市巴拉克利亚，当地的组织者自称为“共产党人工农革命党”。成立者是阿道夫和弗拉基米尔·罗曼内科兄弟，弗拉基米尔 35 岁，在哈尔霍夫当电力工程师，之后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继续学习新闻学。阿道夫是工会积极分子和当地工会报纸《镰锤》的记者。1963 年，弗拉基米尔在列宁格勒遇到一个在同一所大学的中国学生，从中国人那里他获得了毛主义著作。在研读完从中国同学那里得到的作品后，弗拉基米尔把这些著作带到了家里，阿道夫也开始研读。 [33]

在 1961 年十月，兄弟两人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谴责苏共二十二大。在弗拉基米尔后来给当局的报告中，兄弟两人已经“被中国的宣传所迷惑”，并且相信苏共现在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不再代表苏联劳动人民的利益。在 1964 年 9 月，兄弟俩创建了共产党人工农革命党，发表声明宣称：

“每一天，普通工人的收入同领导专家及党政官僚的差距都在扩大……甚至所谓的党-国控制机构正在从它的缔造者那里窃取剩余价值（即从工人劳动中攫取利润）……

“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失去效力——这不仅对工人阶级是必要的，对农民阶级也是……那些人甚至只是提一下无产阶级专政就感到牙疼，他们在半资本主义国家以‘全体人民’（指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已经成为‘全民专政’，而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攫取剩余产品。当执政党不是同这种剥削作斗争，反而促使其合法化，那么这样的政党就是小资产阶级的……”

然而，几个月后兄弟俩就被克格勃逮捕，随后他们的党就解散了（没有发现证明该“党”超出兄弟两人范围的证据）。阿道夫依然继续表达他的想法并支持文化大革命，他后来说到：“我得出结论认为在现有状况下平等和友谊是不可能的，我相信苏联共产党不能代表人民意愿……我相信工人群众和领导层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并且由此，我相信苏共同人民之间不可能再团结起来。”

兄弟两人面临着长期监禁，但完全是由于时机的巧合才得以脱身。在他们被逮捕后的第二天，10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举行全体会议，罢免赫鲁晓夫，任命列昂·勃列日涅夫为总书记和阿列克谢·柯西金为总理。勃列日涅夫刚上任就希望自己能解决中苏决裂二问题。哈尔科夫当地的克格勃做出决定。在中国代表团面前释放罗曼内科兄弟，以帮助勃列日涅夫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然而，罗曼内科兄弟的余生依然在克格勃的监控之下，这使他们不能重建他们短命的党或参与其他抗议活动。

1966年，中国坚定的欧洲盟友，阿尔巴尼亚发表公报公开了一个苏联地下组织——苏联革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苏革共（布）（SRC（B））。苏革共（布）在79页的《纲领声明》中强烈谴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集团对斯大林的诽谤、他们宣扬的和平共处与缓和斗争的教条以及苏共党领导层的奢侈生活，同时称赞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是社会主义仅留的堡垒。这份神秘的声明宣称其已经在苏共干部内分发，而这些人已经着手建立一个新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来推翻苏联政府，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反修方向^[34]。这可能并不是第一份苏联境内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声明，但是它的确是第一份引起全世界亲北京党关注的声

明。然而，尽管这份文件在国际左翼出版物中被广泛传播并得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支持，但苏革共（布）并没有再继续做出什么事情——似乎只是个局限于阿尔巴尼亚境内的纸上组织。

最近，最高法院和前苏联政治迫害受难者办公室（Prosecutor's Office of the USSR）的档案工作显示有一大批人因亲斯大林言论而接受审讯，甚至还有一些毛主义言论（主要是学生、记者和作家的）。^[35]最近由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和谢尔盖·米罗涅科出版和编辑的一本汇编——《煽动言论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的其他思想》（现在已有多在线俄文资源），是记录从乌克兰罗曼内科兄弟到西伯利亚激进学生这些案件的真正宝藏。

汇编的作者也列下了试图在苏共党内建立新的党或新势力，但是被当局破坏的小团体的名单：“争取正义联盟”、“群众争取正义组织”、“实现列宁思想斗争党”、“苏联社会主义党”、“争取工人自由党”、“工农地下党”、“俄国劳动党”、“诚实工人联合会”和“人民党”。作者继续写到，这些组织的名字表明“它们的成员是在为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旗帜下行动的”，并且“绝大多数工人组织并不打算推翻苏共政权，文件表明这些组织认为它们的主要敌人是‘官僚主义者’、‘苏联资产阶级’和‘共产党员资本家’。”^[36]

表达对苏共路线的反对以及提倡回到赫鲁晓夫之前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别普遍的方式是破坏自己的选票。《煽动言论集》里有许多废票和宣传册被扔进投票箱的例子：1957年3月，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一张选票上声称赫鲁晓夫通过“谋杀贝利亚”和“诽谤斯大林

同志”攫取权力，以及镇压匈牙利革命是错误的。在 1958 年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沃洛格达的投票点和火车站被海报覆盖，海报上谴责赫鲁晓夫摧毁了斯大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其他坚定（社会主义者）的贡献，以及苏共已经变成了“世界全体人民”的叛徒。还有更多持续不断的对“苏联资产阶级”的谴责——这可能受到了北京言辞的启发。

1999 年，国际民主基金会在莫斯科出版了另一编反苏煽动言论案例集，同样是由科兹洛夫和米洛涅科主编。它详尽揭示了一些苏联公民中的毛主义观点。最早在 1962 年 10 月 8 日，“D·埃莱夫泰留”——一个流亡苏联的前希腊共产党员，因为在塔什干、苏维埃塔吉克斯坦散布声称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是社会主义仅有的捍卫者的小册子，而被逮捕。

^[37]1966 年 8 月 12 日，一名在莫斯科学习技术的俄罗斯学生因散发反对苏共的“诽谤性的手抄本”而被指控试图叛逃到中国。在阿穆尔河畔共青城，3 名共青团员因在城市周边分发海报，并喊着“毛泽东是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们，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同反共接班人赫鲁晓夫作斗争！”的口号而被逮捕。^[38]

1967 年 1 月 12 日，郭丹青（Guo Dan-Ching），一名在苏联科学院学习经济学的国际学生，召集了几名俄国毕业学生创建了一个叫做“苏联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毛主义党。他们发表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声明》的纲领，但是在被发现从中国大使馆获得并分发红宝书和其它毛主义著作时就被逮捕了。郭被遣返回国，而令人惊讶的是，对几名俄国学生却不予处理。^[39]第二年，毛主义在莫斯科被发现了两次：1968 年 1 月，一名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学学生展出了 7 幅巨大的海报，谴责苏共，据

说在向毛写信表明自己打算叛逃到中国后，他就被逮捕了。同一年9月，两名莫斯科建筑工人组成了一个叫做“反修正主义斗争联合会”的团体，而在他们被发现向其他莫斯科人发放中国共产党著作时被逮捕。^[40]

科兹洛夫和他同事发现反苏共异见者的数量是惊人的。在众多亲斯大林，或亲北京传单、废票和公开信件的例子中，档案来源的数据表明，在1953-1986年期间发生了4000-5000件关于“反苏宣传”的法庭诉讼。如果“工人中的大多数”（指写那些宣传品的人）真的并不打算推翻苏共政权，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苏联社会内部有一股反修（至少是坚定左翼分子）的主要反对思潮，尽管是碎片化的、自发的和分散的。如果我们相信苏联法庭记录，情况确实是如此。

苏联末期，左翼反对者的煽动言论记录已经以英文出版了。著名历史学家、自由民主异见人士、莫斯科赫尔辛基观察小组联合创始人（一个监控苏联违反人权行为的智库）卢德米拉·阿列克谢娃在她的专著《苏联异见者：当代民族，宗教和人权运动》中写道甚至有更多“反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微型团体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不断的兴起与衰落。她指出，“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基本都是只包括年轻人的地下与半地下组织和团体”。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都是封闭的；只有少部分情况2-3个组织间有联系，而这些联系也不超过联席会议范围。这些战后的新一代的年轻人都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爱国者。他们不愿意推翻现有秩序，而更愿意让它回到“真正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41]

在一个例子中，阿列克谢娃描述了一群来自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毕

业生，他们原本是共青团反犯罪巡逻队成员，他们写了一个题为《从官僚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这个纲领主要由其中两名成员瓦莱里·朗金和谢尔盖·哈哈耶夫在 1962 年写成。在 1965 年，他们开始出版杂志《钟》（Kolokol^[42]）。然而，在出到第三期的时候，他们就被逮捕了。同一年，高尔基市的一群教师和学生因写了一篇名为《社会主义和国家》的文章也被捕入狱。^[43]1959 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三名年轻的拉脱维亚工人古纳尔·贝津斯、莱莫尼斯·玛尔坎坦斯（Laimonis Markants）和瓦莱里·阿克克批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对中国的态度，他们因在三个区域散布了 8000 份传单而被捕。^[44]

20 世纪 70 年代，索洛托夫出现了一个叫做“真正共产党”的组织，而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为实现列宁主义思想而斗争党”分裂了。1963 年，在远东，军官们创建了“为列宁主义复兴而斗争联合会”，它的创办人，战争英雄格里戈连科将军，写下呼吁复兴“真正的列宁主义”的传单，并让他的军官把这些传单送到莫斯科“镰锤”工厂。

1976 年 2 月 24 日，苏共二十五大开幕日，4 个年轻人在列宁格勒涅瓦大街旅馆庭院（Gostinny Dvor^[45]）商场走廊下抛洒 100 张传单，高喊着“新革命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由毕业生阿尔卡迪·特索尔科夫领导的这四个学生随即被逮捕，并被退学和开除共青团籍。同年 4 月，一群被叫做“列宁格勒学校”的特索尔科夫的同学和同志宣布了一个旨在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纲领。他们称苏联体制是“垄断资本主义”（回应毛主义话语）。他们要求通过工人斗争来“消灭国家官僚的权力”。之后，他们在列宁格勒外成立了一个社团；到 1978 年春，他们开始称呼自己

为“左翼反对派”并开始印刷杂志《展望》（*Prospekti*^[46]）。来自莫斯科、高尔基市和其他城市的志同道合思想者在读完杂志后打算加入他们，但是有 40 人在路上被捕了。几个月后，整个社团被逮捕了，而特索尔科夫被判五年监禁与两年流放。^[47]

要注意的是，阿列克谢耶娃——尽管她是亲西方人士，她的文章清楚的写到“异见者中那些希望彻底颠覆苏维埃体制的人是很少的，事实上只有孤立的少数。”这个议论非常有趣。尽管她的这本书写于 30 年前，^[48]但还是值得重温以获得对“其他思想者”的新看法。^[49]

用俄语或英语记录的在苏联内最后一个^[50]的实现反修马列主义运动的尝试，是由工人格里戈里·伊萨耶夫和阿列克谢·拉兹拉斯基领导的工人中心的事迹。拉兹拉斯基是住在萨马拉的一名石油工程师，他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并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在 20 世纪 70 年代，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拉兹拉斯基开始对统治集团感到不满，尤其在被拒绝入党后。在与同一工厂的技术员兼工程师的伊萨耶夫见面后，两个人马上开始大量印刷宣传册并分发给他们的同事。据拉兹拉斯基儿子称，很快他们两人获得 30-50 名同伴并开始在工作场所外举行会议；最终他们在城市里其他工厂也发展了同志。^[51]

最终，他们的工作在一系列连贯的行动中达到高潮。他们自称工人中心，并在马斯列尼科夫（Maslennikov）工厂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赢得了关于工作条件的要求。最终，这个团体成功发动大约 10 次小型罢工并组织了多个工厂委员会^[52]。尽管国有企业最终还是屈服于罢工的少许政治诉求，但是工人中心还是引起了关注——以及地方当局的愤

怒。

在他们成功发动罢工几年后，1979 年，工人中心发表了《第二个共产党宣言》（**Second Communist Manifesto**）。在宣言中，工人中心声称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复辟，工人同志们是时候创建一个新的先锋党——“无产阶级专政党”（**PDP**）^[53]。拉兹拉斯基和伊萨耶夫在这份文件也陈述了他们自己对毛泽东的辩护，“‘文化大革命’直接呼吁惩罚……形成中的官僚政治，用残酷的事实向群众表明人民群众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在集体行动中是无所不能的……而毛泽东逝世对中国，就像斯大林逝世对苏联，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结束。”^[54]

尽管该党的活动自创办第一年起就衰弱了，拉兹拉斯基和伊萨耶夫持续创作越来越多的文章。最终在 1981 年 12 月——波兰开始出现劳工动乱同一个月，当局终于受够了，克格勃逮捕了他们两人并解散他们的党。^[55]拉兹拉斯基的儿子写到他父亲“被判处 7 年监禁加上 5 年流放，而伊萨耶夫是 6 年加 5 年（因为他有两个孩子所以少判一年），拉兹拉斯基的同伴科帕罗夫被判处监禁。其余人仅需要表明改过自新，而其中苏共党员的被开除出党，担任管理职位的被开除解雇。”在俄罗斯，一个最近创办的小型左翼组织称呼自己为“无产阶级专政党”；尽管他们受到拉兹拉斯基精神的鼓舞，但是他们并不愿给自己贴上反修正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或毛主义者的标签。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党在 1981 年底的解散，在苏联再也没有出现过尝试建立反修战线的尝试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理解呢？为了总结在苏联的“反修正主义”（毛主义或新斯大林主义）经验，必须提出两个问题，或展开更广泛的对话。

第一点：这些在苏联各地频繁出现又消失的微型团体——通常至多有几十名成员——能说明什么呢？如果真如科兹洛夫和柳德米拉所说的，苏联公民中不同意苏共路线的人中大部分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非希望实现自由民主式资本主义，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梳理苏联内的各种异见思潮呢？对于苏联人如何看待非正统意识形态的思想，必须在西方话语外注入更多解释。在苏联主流媒体中被描述为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人都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而需要被镇压，他们未必被贴上了煽动叛乱、外国特务的标签。反苏，但并不一定反共。不管怎样，大多数被逮捕并定罪的这些组织成员和那些试图推行反修路线的人都或仅仅被判刑几年、或被罚款、或仅被开除出党或共青团（对比那些被判处更长刑期甚至在古拉格终生监禁的亲西方的异见者），这些说明了苏联当局如何看待反苏共的马列主义者。看来，*dissyidenti*^[56]——这个更多暗示了叛徒意味的范畴，仅仅是一个更宽泛概念 *inakomyslyashchii*^[57]（其他思想者）的一部分。

第二点：为什么苏联的反修正主义失败了？为什么华约中最强大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东欧反修正主义最少的国家之一？尽管经过了彻底的调查研究，但似乎不管是毛主义者还是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反修正主义者都只局限于独立的个人、微型“政党”，或者生活工作在苏联的中国官方工作人员的行动，只有第比利斯起义和工人中心罢工是唯有的例外。从整体来看，反修正主义仅仅在苏联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毛主义只是其中一点零星的火花。

请允许我就毛主义在苏联被扼杀的原因提出一些自己的假设。首

先，削弱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是极其困难的：苏联的意识形态格局是如此的单一，以至于认为任何东西“形左实右”（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在苏联发展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斗争是作为一个警察事务来巩固的，或者是作为一个高层的问题，把那些对苏共路线持异议的下层人边缘化，这种做法并不可以与毛泽东更为“无政府状态”的意识形态斗争（即文化大革命）相媲美。所有其他的左派思想都被认为要么不如苏式马列主义先进精妙，要么被认为偏离了“正确”道路而不可避免地会被反革命利用并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前景构成威胁（如毛主义的例子）。

同样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相较于本文后几章可看到的，中国大使馆向普通苏联民众散布毛主义著述的力度比在华约其他国家，如东德、匈牙利要显著的低。也许因为苏联的高压军事力量，中国人并不愿冒险资助一个全面反对苏联政府的叛乱，而去选择削弱其政府的边缘地区？中国与苏联的冲突已经够多了，无论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解放军与苏军的边境冲突中：被指控在苏联境内煽动异见可能只会使已经激化的敌对行动升级。最终，苏联毛主义者可能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政治而被“晾在一边”^[58]。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苏联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监视制国家。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到来之前，克格勃、共产党和共青团在苏联保持着稳定的社会和司法控制，而勃列日涅夫还采取措施使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社会开放程度大幅度倒退。电话很容易被窃听，邮件经常被搜索和审查，而且每个工作场所和学习机构都有克格

勃特工。所有形式的报刊都是国有的，只有通过一些作者自行出版（samizdat）的出版物和期刊，我们才能看到一些独立作品。国家对共青团的大量内部监管和监视，也使青年人几乎不可能组织起地下异见者并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这个警察国家覆盖了 860 万平方英里的森林、山脉、沙漠、草原和冻土带。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有一种隐蔽的交流方式来互相沟通，在如此广大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全联盟的马列主义政党的任何尝试都注定要失败。最终，苏联的毛主义（以及更广泛的反修正主义）并不是一场风暴，而仅仅是零星几阵暴雨。

然而，史学还在那里。科兹洛夫在描述第比利斯起义时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从最高法院和苏联受迫害者办公室的档案中进行的研究，都表明那里有故事等待被讲述。阿列克谢耶娃早前以自由民主异见人士的身份，记录了苏联意识形态镇压的编年史，揭示了反对苏共的坚定左派的存在，而今天，一些俄罗斯左派试图留存这些被遗忘的革命组织的记忆。英语历史学家必须着手翻译现存的俄语出版作品，帮助他们的俄罗斯同行开放旧档案，并构建一个新的苏联煽动言论史。

注：

^[1] 原文参见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 年 11 月 6 日)。

^[2] Austin Jersil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115。

^[3] Vladimir A. Kozlov, *Mass Uprisings in the USSR: Protest and Rebellion in the Post-Stalin Years* (London: M.E. Sharpe, 2002), 113。

[4] 同上，113，129。

[5] 同上，115。

[6] Jersild，115。

[7] Kozlov，114-116。

[8] Jersild，115。

[9] Kozlov，117。

[10] Jersild，115。

[11] 但没有发表演讲。

[12] Kozlov，118。

[13] 同上，117。

[14] 同上，124-125。

[15] 同上，126-127。声称伤亡人数达到了很高的数百人的数据真实性尚不清楚。

[16] “We Shall Not Allow Criticism of Stalin: The Incidents in Georgia, March 1956”,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5, no.2 (September 1999), [http:
//www.revolutionarydemocracy.org/rdv5n2/georgia.htm](http://www.revolutionarydemocracy.org/rdv5n2/georgia.htm)。

[17] Kozlov，134-135。

[18] 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37-39。

[19] 同上，103。

[20] The Polemic on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418-467.

[21] “Brutal Aggression by Soviet Revisionist Renegade Clique Against Czechoslovakia Resolutely
Condemned, ”Peking Review, 11, no.35, (August 30, 1968): 9-12.

[22] Tanya Frishey, “Soviet Youth Culture, ”in James Riordan, ed., Soviet Youth
Cultur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3-4。

[23] 同上，22。

[24] 译者注：俄文свой的音译，字面意思应为“自己”、“自己的”、“个人的”。

[25] Riordan, 38。

[26] Abraham Katz,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2), 53-58。

[27] 同上，93。

[28] Jan Adam,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the 1960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41-42

[29] 同上，46-49。

[30] Katz, 182。

[31] 同上，168-172。

[32] V.A. Kozlov and S.V.Mironenko, eds. *Kramola: Inakomiclie v SSSR pri Khrushcheve i Brezhneve 1953-1982*[Sedition: Other-thought in the USSR Under Khrushchev & Brezhnev](Moscow: Mainland, 2005), transcription available at [http: //www.universalinternetlibrary.ru/book/24151/ogl.shtml](http://www.universalinternetlibrary.ru/book/24151/ogl.shtml) and [http: //library.sakharov-center.ru/](http://library.sakharov-center.ru/)。

[33] *Programmatic Proclamation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Bolsheviks)* (Tirana: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75-79。

[34] Kozlov and Mironenko, *Kramola* [Sedition]。

[35] 同上，“Documentation.”。

[36] Vladimir Kozlov and Sergei Mironenko, eds. *Nadzornie Proizvodstva SSSR Po-Delam Ob Antisovietskoi agitatsii i propagandi*. [Review of Proceedings of the USSR Prosecutor's Office in Cases of Anti-Soviet Agitation and Propaganda, Annotated Catalog 1953-1991](Moscow: Mezhdunarodni Fond «Demokratiya»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Fund], 1999), 672-673。

[37] 同上，678。

[38] 同上，679。

[39] 同上，685，690。

[40] Lyudimila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 Religious, and Human Rights*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5), 421.65。

[41] 译者注：俄文колокол的音译。

[42] 同上，421-422。

[43] 同上，98。

[44] 译者注：俄文гостини двор的音译。

[45] 译者注：此处疑原文有误，Prospekti 估计为проспекты音译，但该词意为大“大街”，俄文中形似的对应“展望”的词为перспективы。

[46] 同上，423。

[47] 译者注：1985 年，本文写于 2017 年。

[48] 同上，423。

[49] 同上，416。

[50] Evgeniy Karsakov, “The Razlatsky-Isaev Case: Pro-Marxist Opposition in the Soviet Provinces Part I.” *The Stanford Post-Soviet Post*. March 14, 2013。

(<http://postsovietpost.stanford.edu/history/razlatsky-isaev-case-promarxist-opposition-soviet-provinces>)

[51] 同上。

[52] Mikhail Kruglov, “Samii Proletarskii iz Diktatorov” [The Most Proletarian of Dictatorships], *Party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proletarism.proletarism.ru/biogis.shtml>)

[53] Alexei B. Razlatsky, “The Second Communist Manifesto.” *Chebarkl Literary Portal*. <https://www.proza.ru/2008/10/24/244>

[54] Mikhail Kruglov, “Arest, poluchaetsya, ne stal vnezapnostu?” [逮捕，来得不是很快吗?]

[55] 译者注：俄文диссидентский的音译，意为“持不同政见者的”。

[56] 译者注：俄文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的音译，意为“持不同观点的”。

[57] 译者注：双关，left hanging，意为“被晾起来，悬而未决”。

[58]

第四章 战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

“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毛泽东《在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

随着苏东集团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一个东欧国家作为捍卫中国的唯一战友挺身而出。恩维尔·霍查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PPSH）^[1]谴责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并支持斯大林和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纵观中苏决裂和文化大革命，在同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对抗中，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是最亲密的战友。

阿尔巴尼亚并未把毛泽东思想本身作为官方的根本思想：他们官方自称为“反修正主义马列主义者”。然而毛泽东的理论仍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群众组织传播。1967年夏末，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霍查安排了两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干部，请求翻译阿尔巴尼亚版本的红宝书。毛泽东准许了，并说：“如果〔我的语录〕有用你们就翻译吧。”他补充说：“中国经验可能可以服务于其他国家，但他们必须自己判断。”^[2]阿尔巴尼亚各地的小红书《人民之声》（Zeri I Popullit）出版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官方报纸《人民之声》撰写了一篇题为“阿尔巴尼亚语的毛主席的语录是从中国兄弟那得到的一个伟大和宝贵的礼物！”的文章。一周后，东德驻地拉那的外交官报告说有教授已经在地拉那大学教授毛泽东语录。^[3]

最奇怪的是，阿尔巴尼亚人不只是传播了毛泽东的著作。1966 年 5 月，第一书记霍查根据部分中国经验亲自复刻了他自己的“思想文化大革命”。霍查宣布阿尔巴尼亚是历史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4]，并呼吁开展解散本国所有宗教机构的运动。他任命了阿尔巴尼亚版本的红卫兵——被称为“阿尔巴尼亚青年”，来执行他的任务。^[5]

思想文化革命有一个奇特的开端。最初，霍查在 1961 年宣布“复辟资本主义的内部经济和社会条件，现在（在阿尔巴尼亚）已经被消灭了”，党和社会不再需要阶级斗争。然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霍查突然推翻了这个总结，似乎思想路线完全改变了。^[6]阿尔巴尼亚的文化革命开始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取消军衔制，将政委重新引入部队，派中、高级官员到工厂、田间劳动，边远山区集体化、集中力量抵御外来影响。^[7]

有趣的是，思想文化革命的主要特点是反宗教：一项研究表明“在 1967 年 5 月内，2169 宗教物品被摧毁、侵犯或转换成其他用途。这个数字包括 600 座修道院和 327 座天主教堂的建筑。”^[8]讽刺的是，当时中国当局已开始阻止红卫兵破坏古庙、文物和其他“旧世界”的象征，而霍查有差别地根据毛泽东上层建筑在文化革命过程中作用的理论开始了他消灭“旧阿尔巴尼亚”的运动。阿尔巴尼亚政府判决“上层建筑必须摆脱一切落后事物和外来因素”，也就是说，霍查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称来为其行为辩护。^[9]

尽管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启发，但阿尔巴尼亚的文化革命从来没有达到前者的规模。阿尔巴尼亚青年只被用来进攻宗教机构和已经推

翻了的地主，在对旧社会的进攻中，没有大规模的工人或妇女组织提供特别的帮助，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同的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军主要被置于幕后，充当要被改变的东西，而不是用来改变的工具。^[10]最后，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倡议，主要由霍查自己策划。这次思想文化革命的发动，相比毛泽东发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信念更加刻意和务实。阿尔巴尼亚人知道，正式脱离华沙条约将导致严重军事和经济上的阻碍，他们需要做好消除任何形式社会弱点的准备。^[11]

伊萨·布鲁米在他关于思想文化革命的重要文章“霍查的阶级战争”中写道：

“最初，对企业董事工作的微妙批评被公之于众……”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工厂批判，但在阿尔巴尼亚，批评是严格通过党领导的工会进行的，“党的路线”这个词远比中国的“群众路线”^[12]这个词流行。代替了毛主义的“炮打司令部”（改造党）的是，霍查想集中精力把阿尔巴尼亚工人改造成“新人”（改造人民自己）^[13]。阿尔巴尼亚文化大革命复刻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使用 Flete-ruffe（一种街头板报形式）或“墙报”，但只用于宣传口号和批评“被误导”的公民。^[14]1968年4月9日，党发布了一则建立新“工人委员会”的呼吁（参见中国的革命委员会）然而，到1969年底，党停止了工人委员会的工作，因为党认为他们像是苏联时期的管理者（他们在阿尔巴尼亚被霍查定性为修正主义者的阶级）所以被果断地赶下台。^[15]这给阿尔巴尼亚文化大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之间带来了明显的理论差异。与阿尔巴尼亚人认为一切矛盾都已被消灭的观点相比，中国人认为，旧思想会不断再生，因此走资派会不断反抗，直到全面共产主义的实现。^[16]

党之外的反修正主义不属于党的范畴，特别是毛主义的反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霍查说“即使是中国同志有所要求”，在阿尔巴尼亚也不会有独立的亲北京活动。任何来自中国的毛主义作品或宣传材料都将由阿尔巴尼亚当局独立分发。^[17]霍查认为，这种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外思想的严格处理，是确保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反修正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正确保持自己既定路线的一种方法。不幸的是，霍查犯下了致命错

误：发动文化革命，却没有将其针对党内反对者，却将矛头直指已经被人民社会主义共和国剥夺了基本权力的阿尔巴尼亚文化生活的一些方面。这使他的举动开始与毛主义的继续革命学说大相径庭时，很容易受周围人的攻击。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霍查突然脱离中国路线，宣称毛泽东一直是修正主义者，而且霍查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一直反对他。这导致了中阿决裂，导致许多毛主义政党分裂成三股势力：支持“四人帮”、支持邓小平和支持霍查，极大地削弱了全球的毛主义运动。^[18]

注：

^[1] 为了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区别开来将使用缩写“PPSH”。

^[2] 伊莱多·梅希利（Elidor Mehilli），《毛泽东和阿尔巴尼亚人》，库克人，166。

^[3] 同上，166-167。

^[4] 在阿尔巴尼亚之前，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只是要求政教分离。虽然无神论是通过国家宣传来鼓励的，并在学术机构中教授，但是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却没有在宪法或法律中正式自称为“无神论者”。

^[5] 蒂拉·哈希亚·卢贾亚，《意识形态和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分析》，社会学研究 1，第 6 号（2011 年 11 月）：469。

^[6] 得·R·普里夫蒂（Peter R. Prifti），《自 1944 年以来的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国内外发展》，（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出版社，1978），普里夫蒂认为，考虑到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和北京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已经统一，某种形式的文化革命式的运动最终将不可避免，143-144。

^[7] 雷蒙德·齐克尔和沃尔特·R·伊瓦斯基合编，阿尔巴尼亚：一项国家研究，（华盛顿：阿尔巴尼亚图书馆 GPO 国会，1994），（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GPO，1994），49。

^[8] Ljarjaa，469。

^[9] 同上，470。

[10] 普里夫蒂, 146。

[11] 伊萨·布鲁米-霍查的“阶级战争：文化大革命和国家改革，1961-1971”，东欧季刊，33，第3期（1999年9月）：305。

[12] 同上，311。

[13] 同上，312。

[14] 同上，319。

[15] 同上，320。

[16] 梅希利在库克，175。

[17] 同上。

[18] 关于中阿分裂及其对世界各地毛主义政党影响的主要文件，我会在网上推荐马克思主义者网络档案馆的反修正主义百科全书(<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rol/>)。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恩维尔·霍查自己对毛主义的论战，《帝国主义与革命》（地拉那：外语出版社，1978）与美国毛主义者 J.Werner 的反驳《反击教条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进攻——评恩维尔·霍查的《帝国主义与革命》》，在美国革命共产党理论刊物《共产主义者》第5期上，（芝加哥：RCP 出版物，1979年），网址为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rol/ncm-5/rcp-hoxha/index.htm>。

第五章：保加利亚的喧嚣：1965 年的政变企图 和 1968 年的世界青年学生节

“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毛泽东在 1944 年 9 月 18 日党中央招待后方部队模范学习代表招待会上的讲话

随着中苏决裂变得不可逆转，由毛泽东引发的不同意见的裂痕开始在苏东集团中显现出来，其中最具戏剧性和级别最高的一次是 1965 年 4 月保加利亚索菲亚的军事政变。但它也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内部特定派系之间出现的重大分裂的必然结果：切尔文科夫派（斯大林主义者、“反修正主义者”）、尤戈夫派（更具民族主义色彩，以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著称），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日夫科夫派（亲苏联，亲赫鲁晓夫）。^[1]这一分歧在 20 年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甚至早在 1945 年，“本土共产党”（“home communists”）和“莫斯科派”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歧。^[2]

1954 年 3 月，中央委员会选举保加利亚共产党新任总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许多中下层党政官员对他感到不满。^[3]前任总书记（也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罗夫的姐夫）瓦尔科·切尔文科夫被称为保加利亚的“小斯大林”，支持中国抵制去斯大林化，这使得日夫科夫不断排挤他，尽管他在众多保加利亚共产党员中很受欢迎。^[4]“本土共产党”（现在由切尔文科夫派、尤戈夫派和保加利亚军方民族主义者组成）认为，日夫科夫和“莫斯科派”不仅使保加利亚和苏联结盟，而且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了类似于苏联附庸国的国家。由于日夫科夫在军事

和经济改革中照搬苏联模式，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硬派和保加利亚人民军被激怒，密谋发动政变，反对总书记的修正主义。^[5]

政变的策划者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密谋头目伊万·托多罗夫·戈伦亚，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和二战中的反纳粹老兵；外交部长索洛·克拉斯特夫（Tsolo Krastev），前驻朝鲜大使；茨维特科·阿内夫（Tsvetko Anev）少将，索菲亚军事要塞指挥官；还有国防部副部长斯拉夫乔·特兰斯基（Slavcho Transki），另一位反纳粹抵抗英雄。^[6]其中托多罗夫·戈伦亚、阿内夫和特兰斯基的军事背景尤为重要，这种领导不仅对武装政变至关重要，而且事实上“尽管保加利亚不是一个公认意义上的军国主义国家，但保加利亚人始终赋予其军队在国家机构中特殊的荣誉地位。”^[7]策划者们认为，将民众团结在反修正主义的马列主义旗帜下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唤起一种使保加利亚人民摆脱苏联枷锁的文化感情。

政变将按如下方式实施：阿内夫将军的军事驻军将切断通往首都的所有道路和桥梁，摧毁所有通讯中心，占领机场。与此同时，托多罗夫·戈伦亚将率领部队冲进中央委员会，抓住包括日夫科夫本人在内的 11 人政治集团。^[8]然而，对于策划者来说，一切都没有按计划进行，政变企图很快就暴露了。策划者不知道的是，苏联和保加利亚的情报部门一直在监视着个别的策划者和其支持者，直到 4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场逮捕、清洗和降职的浪潮席卷了党和军队，最终以 4 月 7 日托多罗夫·戈伦亚的自杀结束。^[9]

这次政变是史无前例的。除了 1960 年阿尔巴尼亚的政变，任何试

图用军事手段推翻苏联集团国家的企图都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10]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保加利亚共产党又作何解释呢？谣言和官方的解释开始到处泛滥。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等暗示，托多罗夫·戈伦亚和他的组织策划了一场“亲北京的政变”^[11]，并直接受到毛泽东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启发。《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日夫科夫宣称这些策划者是“亲华分子……有落后思想的人”。^[12]论坛报还指出，在中国官员进行外交访问后不久，政变预谋就开始形成。美国、苏联和保加利亚的媒体似乎都把矛头指向一个充当政变幕后主使的罪魁祸首：中国。

然而，很难绝对肯定地说 1965 年保加利亚的政变是“毛主义”的。没有发现任何北京向策划者提供援助的任何实质性证据或文件，中国官方媒体也没有报道或声援他们的被捕。就像 1956 年格鲁吉亚对苏联起义期间朱德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的出现一样，政变前不久的中国外交使团到访似乎是巧合，只能心存猜测。尽管中国反对苏联集团的去斯大林化和经济改革无疑启发了政变策划者，但上述的民族主义因素和对苏联军事统治的不满成为了反抗日夫科夫政权的更直接诱因。随着政变的平息，保加利亚政府简单地将所有关于政变企图的进一步讨论都藏匿起来，直到 1989 年政府解散。

然而，三年后，索菲亚将再次被中国的幽灵所震撼，但这一次，索菲亚的运动带着更明显的毛主义色彩，而这来自一群骄傲的外国人。奎因·斯洛博丹（Quinn Slobodian）在他 2012 年出版的专著《外国阵线：六个德国人的第三世界政治》（*Foreign Front: Third World Politics In Sixth Germany*）中讲述了一群来自西德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的毛主义学生如何在 1968 年苏联主办的世界青年学生节（WFYS）上引起戏剧性骚动的故事。世界青年学生节是一个由世界各地左翼政党组成的青年联盟（主要包括与莫斯科结盟或中苏决裂时选择不结盟的共产党的青年联盟）组成的半年度聚会，将于当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6 日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13]中国的红卫兵代表团来参加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不过，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DS）^[14]受到了邀请，但他们几乎是作为中国红卫兵的代理代表团来到这个节日的。^[15]

保加利亚和苏联领导人最初对一群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加世界青年学生节会议的西德社会主义者毫不在意。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 1968 年 7 月 27 日开幕式后，麻烦会接踵而至。当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走过苏联领导人时，他们高呼“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还拿着毛主席的画像，公然表示苏联的反对^[16]。后来的活动充满了麻烦，德国毛主义者一再中断亲苏青年活动，要求围绕中苏决裂中的关键问题展开辩论和讨论。德国毛主义者在保加利亚活动的最终高潮是在美国驻索菲亚大使馆外举行了一次未经批准的抗议越南战争的活动，在闭幕式上，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反复高呼着“卡斯特罗！毛泽东！格瓦拉！”后离场。最终，毛主义以这种公然挑衅的方式分裂了保加利亚和德国波恩^[17]，而不是其回到源头北京。

注：

^[1] J.F. Brown, “The Bulgarian Plot,” *The World Today*, 21, no. 6 (Jun 1965): 265-266.

[2] 同上, 264.

[3] 同上, 266.

[4] 同上, 264-265.

[5] “Purge Expected in Bulgaria: Diplomats Link It to Coup That Failed,” Chicago Tribune, April 22, 1965, sec. 2A, 5.

[6]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还有其他有权有势的人物“至少承诺过, 一旦阴谋的第一步行动成功, 他们会予以支持”。切尔文科夫是否参与了政变, 或知晓政变, 似乎不得而知, Brown 262-263.

[7] 同上

[8] “Bulgaria: The Black Sheep,” Time, 30 April 1965,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898659,00.html>

[9] 同上

[10] Brown, 261.

[11] “Bulgaria: The Black Sheep”.

[12] “Pro-Chinese Blamed for Bulgaria Coup: Zhivkhov Fixes Guilt in Abortive Effort,” Chicago Tribune, July 17, 1965, sec. A, 12.

[13] Quinn Slobodian, *Foreign Front: Third World Politics in Sixties West German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4-195.

[14] “德国 SDS”一词是用来区别于美国的 SDS, 即“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这是另一个存在重叠的激进的学生组织, 内部包含一个毛主义派别。

[15] 需要澄清的是, 虽然中国政府总体上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 但北京本身对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作为北京在世界青年学生节的官方代表的看法很矛盾。

[16] 同上, 196-198。

[17] 同上, 195。

第六章 变成“中国人”：毛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1]

西德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并不是唯一一个以毛泽东的名义公然反抗莫斯科的德国青年组织。在柏林墙的另一边，一小批年轻一代的东德共产主义者（也有一小批纳粹集中营中幸存的年长而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者加入）向他们已经组成一个名为德国共产党/马列主义（KPD/ML）的有凝聚力的毛主义政党的西德同胞们伸出了援手。德共/马列一直试图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分部，希望在北京针对莫斯科的全球宣传战争升温之际，利用东德青年对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满及东德经济萧条、威权主义的苏联统治模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似乎是一个命中注定痛苦的政治和经济悲剧。当其他的东欧国家被苏联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民主德国（俗称东德）从德意志帝国自身的毁灭中诞生了，德意志帝国被同盟国一分为二，它东部的大部分领土被作为对战争暴行的地理赔偿划给了波兰。苏联红军于1947年建立了德国经济委员会（Deutsche Wirtschaftskommission，简称DWK），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2]德国经济委员会立即就将向其他苏东国家支付的赔款加在国家身上，在其存在的时间里试图完全复制莫斯科的模式，“直至最后一台机器，直至最后一

个工业生产单位”^[3]。在 1949 年，德国经济委员会被解散，经济规划被移交给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苏联建立的执政党——德意志统一社会党。

即使从苏联的直接统治过渡到东德的国内统治，以及社会的去纳粹化后，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也没有能很好地服务德国人民，包括本应统治它的工人阶级。东德的月均收入只有 256 德国马克，而即使是单一的食物也要占到收入的三分之一。^[4]暴乱和起义在整个 1953 年接连发生。在年底，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试图通过实施名为“新方针”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来进一步减少不满。“新方针”在意图满足民众的同时，偏离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很像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的政策——停止农业集体化并把资产返还给农民和企业主（特别是如果他们在财产被没收后逃往西方的话）。

二十多年后，在 1967 年，一项被称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新政策对工资和价格的设定以及企业管理的自治进行了改革。^[5]像赫鲁晓夫一样，乌布利希被认为是没有能力推进经济改革的，并于 1971 年被更加勃列日涅夫化（同时也与勃列日涅夫结盟）的艾里希·昂纳克取代。就像柯西金改革对苏联反改革者的影响一样，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将会被东德德共/马列的毛主义者用来证明东德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而德国统一社会党是苏共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代理人。

1968 年是风狂雨骤的一年，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全球没有一片不被影响的“净土”。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试图从顶层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导致苏联入侵他们的国家以及运动的失败。与此同时，

在中国，文革进入了疯狂的高潮。随着红卫兵和其他的激进群众组织已经脱离了毛的掌控，国家被拖入了毛所称的“全面内战”^[6]。这一年也诞生了更多的毛主义政党(很多都比几年前的毛主义政党更激进，更以年轻人为导向)，包括西德（联邦德国）的德共/马列。与此同时，在东方，1968 年的年轻人开始形成以毛主义为核心的激进学习圈子，并在这种情况下学习了独立于高中和高校马列主义课程之外的马、恩、列的一些经典著作和官方不认可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霍查的作品。

在 1969 年，进步青年（Progressive Jugend，简称 PJ）组织在马德堡成立了。进步青年只有大约 100 个全职干部，但一小群模仿全球激进社会运动的支持者被团结起来。例如，进步青年因穿着美国黑豹党风格的制服^[7]拿着刚从中国驻东柏林大使馆（一个将会在这点上给东德官方带来极大痛苦的大使馆）获得的“红宝书”而闻名。^[8]在 1970 年代早期，进步青年不仅有了柏林和马德堡的支持者，还在主要的港口城市罗斯托克拥有支持者，这使他们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基础。^[9]

进步青年最终联系到了在联邦德国的德共/马列并且成立了该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部”。在 1976 年 2 月 7 日，一部标题上写着“德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部成立宣言”的小册子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印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的头像。^[10]小册子包含了新共产党的纲领以及一系列谴责东德经济模式是“彻底的资本主义模式”^[11]及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国家的叛徒”、“莫斯科的附庸”^[12]的文章。这是一份具有煽动性的文本，宣称将对国家进行全面的阶级斗争并打算将阶级斗争带向全面胜利。像他们的西德同志一样，德共/马

列的东德分部成功地变成了“中国人”，把中国的审美以及红卫兵不择手段摧毁修正主义的目标转移到了他们自己身上。^[13]

东德分部开始印刷自己版本的中央党报《红色黎明》（*Rote Morgen*）并在大学校园散发它，并定期把党报的复印件塞进工人阶级邻居的邮箱。^[14]尽管只有几十个成员，东德分部像进步青年那样团结了一小部分同情反修正主义的东德市民作为他们微小的基础，这很快就激怒了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通常被称为“史塔西”）。躲避史塔西和躲避克格勃一样是不可能的，如果算上前者遍及 1600 万人口的两百万平民线人则更是难上加难。干部被捕经常发生，《红色黎明》经常报道德共/马列被囚禁在东德监狱里的囚犯，直到该报在 1982 年解散。

尽管民主德国经历了十年规模虽小但充满活力的毛主义活动，但其作为毛主义的有凝聚力先锋的时间只持续了两年。在 1978 年，德共/马列，包括它的东德分部，在中阿决裂中倒向了阿尔巴尼亚，而在 1986 年，德共/马列的新霍查主义化身解散了它的东德分部而其并入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并与之组成了统一社会主义党，并在 80 年代晚期逐渐消失。东德毛主义者未能建立群众基础或严重威胁德国到统一社会党的体制（史塔西当然是这么看待他们的），直到 1989 年柏林墙倒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继续成为东德人民参与的唯一马克思主义学派。

与苏联和保加利亚人的经历不同，毛主义在民主德国的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与它有着更显著的跨国性，同时也有更多中国政府对毛主义传播的直接参与。想要真正地领会毛主义者在东德的存在，我们必须转向铁幕背后文革最活跃的“根据地”：东柏林的东德大使馆。大使馆很有“捣

乱”的本事（引用自毛），并且对德国人敞开大门，充当了毛主义热情而公开的传播渠道。

在使馆周围的街道上，中国大使馆明目张胆地散发德语版的红宝书、传单、小册子给工人、学生和工作人员，并张贴德语海报谴责统一社会党，没有任何在其他保留。^[15]上千份的《北京周报》在东柏林被印刷、分发，还有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其他小册子。^[16]在 1967 年末，平均每天有 63 名德国学生来拜访大使馆以获得红宝书和直接从中国运来的毛主席像章。东德的权力机关非常担心这个事情的发展，于是在 1968 年 1 月切断了对大使馆的一切民间访问并且禁止除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以外的任何人进入大使馆。^[17]

企图煽动东德民众并不是政府主动将中国人控制在使馆内的唯一原因，因为自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中国人已经成为东柏林一大令人头疼的麻烦。奎因·斯隆博迪的综合论文(少数英语版本之一)，《毛主义的敌人：1960 年代中国在东德的挑战》，由当代历史刊物出版，讲述了中国人与当局的冲突是怎么爆发的——中国人先前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东德政府。在东德领土上的第一次重大挑衅开始于 1967 年的红场事件结束后不久，红卫兵被带到了大使馆，以在保护下班途中的中国大使。又不久后，中国人开始在大使馆的土地外布置新玻璃展示窗以展示中国的宣传海报和艺术，以谴责苏联和东德的修正主义。^[18]

随着四名中国外交官死于柏林的一场车祸中，红场事件于 1967 年 6 月开始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立即得出结论，认为东德当局应该对此负责，这起事故实际上是一起暗杀。由于对此深信不疑，工作人员开始在

晚上通过高音喇叭向路过普通群众高呼：“血债血偿”、“打倒修正主义”。

^[19]作为回应，东德公民在大使馆周围的玻璃展示窗上划刻“猪”的字样，并用口红在展示柜上乱涂乱画。双方的挑衅行为最终平息下来，但史塔西和军队针对大使馆的监视始终处于最高水平。^[20]

除了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的学生运动外，毛主义在民主德国的存在远比之前苏东集团的任何地方都要激烈。与苏联的反修正主义者不同的是，在东德的反修正主义者合并成了一个单一国家组织。先是作为一个青年组织，然后又成为了自称的先锋党，而他们的存在也在全国范围内为人所知。他们在文革结束后继续存在直到 1980 年代中期，尽管是作为霍查主义者，以及之后作为与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合并而成的党的一部分。目前英语资源仍然不足，希望这将会得到改变——随着有关在跨国规模上把握第二世界 60 年代精神经历文献资料的翻译和数字化。

注：

^[1] 文见毛泽东，《矛盾论》(1937 年 8 月)，《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1：335。

^[2] Mike Denni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1945-1990*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0), 17。

^[3] 同上，42。

^[4] 同上，55。

^[5] 同上，117。

^[6] William Hinton, *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7。

[7] 同上。

[8] Quinn Slobodian, “Badge books and brand books: the Mao Bible in East and West Germany” in Cook, 221。

[9] “New Revelations”。

[10] Gründungserklärung der Sektion DDR der KPD/ML [Decla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Section of the KPD/ML], (Berlin: Roter Morgen, 1976), 1, [http: //www.mao-projekt.de/BRD/ORG/GRM/KPDML_1976_in_der_DDR_gegruendet.shtml](http://www.mao-projekt.de/BRD/ORG/GRM/KPDML_1976_in_der_DDR_gegruendet.shtml) 125。

[11] 同上, 13。

[12] 同上, 25。

[13] Slobodian, Foreign Front, 177。

[14] Dietmar Kestin, “Roter Morgen': Zentralorgan der KPD/Marxisten-Leninisten, Ausgabe DDR, ”Materialien zur Analyse von Opposition(M.A.O.), [http: //www.mao-projekt.de/INT/EU/DDR/DDR_KPDML_Roter_Morgen.shtml](http://www.mao-projekt.de/INT/EU/DDR/DDR_KPDML_Roter_Morgen.shtml)。

[15] Quinn Slobodian, “The Maoist Enemy: China’s Challenge in 1960s East 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1, no.3 (2016): 19-20。

[16] 同上, 20-21。

[17] Slobodian, in Cook, 221。

[18] 同上, 17。

[19] 同上, 19。

[20] 同上。

第七章 被审判的毛：卡达尔时代的匈牙利毛主义学生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语录，（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版）第182页^[1]

在西方世界眼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可谓是泾渭分明。在大部分人看来，东德是可与苏联匹敌的黑暗警察国家；与之相反，60年代的匈牙利却是惊人的自由宽松。由于西方商品在匈牙利的可获取性、开放的边境政策和与其余苏东阵营国家相比较为宽松的警察政策，匈牙利被描绘为人道主义和国际化的国家，有时被西方媒体描述为“社会主义阵营最快乐的堡垒”。在亚诺什·卡达尔^[2]执政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SWP)因为他们炖汤式地对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和西方自由市场机制的结合而被称为“古拉什（Goulash）^[3]共产主义”。匈牙利人民（以及东德和南斯拉夫）在“古拉什共产主义”时期拥有整个东欧最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很少的政治动荡。

然而，一场由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和信仰共产主义的守旧者引起的动荡却在布达佩斯的校园生活中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同时让匈牙利人民接触到了毛主义。这方面的英语资料并不充足；但亚当·塔卡斯克2012年的报告《毛主义事端：卡达尔政权1960年代的政治与理论思想的整合对年轻人思维模式的影响》（“The Maoist Incident: Effects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solidation on Youth Mentality in the Kádár Regime of the 1960s”）一文中明确提到了关于1968年毛主义学生起义，以及他们

和 60 年代全球社会运动的联系的几项重点信息。^[4]这篇报告讲述了一群极度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革命（特别是越南）的鼓舞下，转向信仰他们国境之外的充满活力的、看起来反权威的社会主义，以及在此之上政治和理论上的反馈。就像他们在西欧和东西德的同志一样，这群年轻人在毛主义中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反权威主义。

如同 1965 年苏联柯西金改革和 1967 年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改革一般，匈牙利毛主义的概念同样植根于经济改革之上。古拉什共产主义——以在更广泛的国家计划机构中使用自由市场机制和小型私营企业而闻名——便是卡达尔政府的 1966-1968 年的“新经济机制”的产物之一。^[5]和 20 世纪 60 年代初保加利亚的改革一样，古拉什共产主义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排挤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过程，这主要围绕着战后党的第一任领袖马加什·拉科西进行。^[6]根据我本人的观察，反对经济上改革开放以及政治上权威主义的守旧者，似乎在 1960 年代的东欧掀起了一股反权威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浪潮。其中最活跃的莫过于布达佩斯大学校园里的学习小组。

第一位匈牙利毛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是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的一个名为加博尔·雷瓦尔（Gábor Révai）的年轻人。加博尔的父亲约瑟夫·雷瓦尔（József Révai）是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参与建立过 1919 年的匈牙利苏维埃。加博尔·雷瓦尔在罗兰大学有着德语和哲学的双学位。如同他的东德同志，雷瓦尔作为一名反对派活动家的开始，是在 1964 年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CYL）框架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小组。^[7]两年后雷瓦尔在广受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

格·卢卡奇的继子费伦茨-加诺西（Ferenc Jánossy）的介绍下结识了著名的西德学生运动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并与其一直保持着联系。有着如此显赫的关系，雷瓦尔似乎注定要成为卡达尔年代最不安分的活动分子。

不久后，雷瓦尔便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的许多志趣相投的人发展了感情。另外两个罗兰大学中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活跃分子——格奥尔格·波尔（György Por）和米卡洛斯·贺拉斯蒂（Miklós Haraszti）也是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8]格奥尔格·波尔（György Dalos）是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的著名作家，同时也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作家协会成员；^[9]以及作家卡塔林·伊梅尔（Katalin Imre.）。^[10]他们都在某一时段造访过布达佩斯的中国大使馆，并且领到了红宝书、毛主义小册子，以及《新中国》（Új Kína）杂志（一份经常批判卡达尔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修正主义的匈牙利语杂志）^[11]，或者与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的中国学生或助教保持着联系^[12]。有了毛主义的武装，这些学生开始称呼自己为“自由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并且组建了两个俱乐部，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被称为“思想家们”和“俱乐部”。^[13]

匈牙利的毛主义者表现得尤其直言不讳，一开始也不倾向于秘密组织。在伊梅尔的出版物中，她常常煽动性地宣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引诱我们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产生好感。在我们的国家，右翼倾向和修正主义者是國家的主调。根本不存在共产主义。”^[14]达洛斯发表了一篇名为《人道主义面具下的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其中他提到，卡达尔政权的特赦是在宣传“对人民的敌人的人道主义”，并不是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5]伊梅尔和达洛斯双双在被警告后逮捕，而伊梅尔因此失去了她在布达佩斯大学文学研究所的职位。^[16]

尽管如此，当越南战争成为匈牙利年轻人中的一大主要话题时，这种毛主义煽动势头得到了加强。匈牙利政府以及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都对北越的斗争表示了支持，但是主张的是“越南需要和平！”，而毛主义者却喊出了诸如“解放越南！”、“胜利属于南越民族解放阵线！”^[17]等等的口号。1965 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立了越南团结斗争委员会，而它完全被毛主义学生们所渗透和占领，这导致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不得不于 1966 年十二月解散这一组织。^[18]对于匈牙利年轻人来说，就如同对世界上所有的激进派年轻人来说，越南被看作更广大的反帝斗争运动的一部分，并且使得毛主义学生们变得更加激进。^[19]

1967 年，毛主义者们最终转入地下，各毛主义俱乐部联合起来，以“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者小组”(GHRC)的名义，发起了一个名为“革命之路”的联合倡议。^[20]它于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对外宣布，“革命之路”宣称“我们毫不掩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目前这个由官僚主义资产阶级掌控，戴着虚伪的修正主义面具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21]到了 1968 年，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者小组整合成为了一个有着六十多名指导员、作为一系列武装反战斗争幕后组织者的中央小组。^[22]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冲突便是波尔和贺拉斯蒂组织的由两百名匈牙利、非洲和中国学生参与的在布达佩斯美国使馆前的游行。这次行动最终演变成向使馆内投掷燃烧瓶，点燃使馆员工的汽车，以及同阻止学生攻陷大使馆的匈牙利国家警察之间的冲突。^[23]

在一小群坚定的毛主义者进行若干次胆大妄为的违法活动后，匈牙利国家警察最终决定逮捕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小组和几个相关的校园俱乐部的核心领导人。1968年6月9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官方报纸《人民自由报》（Népszabadság）发布了一条对各领导人的“布达佩斯中央法院的最近判决”，但惩罚却是微乎其微的数月监禁或是仅仅给予警告。^[24]审判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关注，但群众对毛主义本身的关心并没有增加。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内对审判不满的匈牙利学生向联盟领导者施压，促使其最终改变了对此次审判的态度。^[25]

审判后，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小组从此解散了，毛主义者再未试图建立一个毛主义的政党。波尔、达洛斯和贺拉斯蒂继续从事他们的反对派工作，在七十年代早期被逮捕过数次，但每次皆只是受到了无足轻重的短期监禁或仅仅是警告。^[26]匈牙利的毛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在工农群众中扎根，而仅仅只是布达佩斯大学精英们的一厢情愿^[27]。在1990年接受《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采访时，贺拉斯蒂回忆了他的行动主义以及幻灭，“我们是匈牙利最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我们失去了信念，马克思主义在匈牙利便已灭亡。”^[28]。尽管这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但1968年被审判的毛主义学生们的确将自己看作马克思的最后传人，生来便是为了保卫共产主义，反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修正主义。

注释：

^[1] 原文参见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3:321

[2] 译者注：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匈牙利人姓名和中国人一样姓在名前，故此处遵照原文这样处理。

[3] 译者注：字面意思为匈牙利红烩牛肉。

[4] Adam Takacs,“The Maoist Incident: Effects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solidation on Youth Mentality in the Kádár Regime of the 1960s”,RESOCEA (Regime and Society in Eastern Europe)Report,2012,67,
http://www.academia.edu/15233364/The_Maoist_Incident._Effects_of_Political_and_Ideological_Consolidation_on_Youth_Mentality_in_the_K%C3%A1d%C3%A1r_Regime_in_Hungary_in_the_1960s/

[5] 同上，21。

[6] 同上，11。

[7] 同上，24-26。

[8] 同上，25。

[9] 同上。

[10] 同上，43。

[11] 同上，41。

[12] 同上。

[13] 同上，46。

[14] 同上。

[15] 同上，46-47。

[16] 同上，47。

[17] 同上，57。

[18] 同上，48。

[19] 同上。

[20] 同上，49。

[21] 同上。

[22] 同上，52。

[23] 同上，53。

[24] 同上，4。

[25] 同上，58。

[26] 同上，59-62。

[27] Robert Gildea, James Mark, and Annette Warring, eds. *Europe's 1968: Voices of Revol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99.

[28] William Greider, “The Morning After: Inventing Democracy in Hungary,” *Rolling Stone*, February 22, 1990, <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news/the-morning-after-19900222>.

第八章 卡齐米日·米雅尔不寻常的一生：波兰 毛主义者 在 1960 至 1970 年间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938 年十月），引用自《毛泽东语录》（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 年）第 271 页。^[1]

毛主义者在苏东集团中最后一个重要典型是一个奇怪而复杂的人。卡齐米日·米雅尔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生平经历：他在 1910 年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的波兰地区，长大后帮助建立了波兰工人党并从 1942 年开始作为共产主义人民卫队与波兰人民军的一员与纳粹作战直到 1945 年波兰解放。^[2]20 世纪 50 年代，他成为了罗兹的市长，而后担任了公共经济部长和部长会议主席。^[3]米雅尔是这样一个已经有如此显赫背景的人，他似乎注定要在新成立的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在他的好友与政治盟友博莱斯瓦夫·贝鲁特死后，他的政治生涯走了下坡路。博莱斯瓦夫·贝鲁特（曾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总统，并在 1947 年直到 1956 年他去世间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4]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是贝鲁特的继承者，他在 1956 年十月实施的经济改革（“哥穆尔卡解冻”，the “Gomulka Thaw”）^[5]几乎是赫鲁晓夫改革的翻版。自由欧洲电台的一份记录告诉我们米雅尔在此时陷入了困境，“最开始，和他志同道合的同伴们一样，他从不公开参与派系斗争。他始终

在所谓的党内民主下行事，尽管他对一些自由主义团体进行了猛烈批判。在波兹南起义几周后（由波兰工人于 1956 年 6 月发动），第七届中央全会开幕。在此过程中，纳托兰（Natolin）派（强硬派）猛烈地抨击了党内“解冻”的倾向，并尝试通过一种已经被波兹南悲剧性地证明了的观点——自由化会让党陷入危险，强硬的政策必须被恢复。这是他们第一次使用明显的煽动手段，例如反犹的影射和故意挑动反苏情绪等等。大会的确给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但众所周知，它未能解决主要问题——党内派系间的严重分歧。大会过后，权力斗争的最后一幕上演了。”^[6]

在 1957 年一月，米雅尔被从公共经济部解职，并且在 1959 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他没能再次当选中央委员。^[7]此外我们看到，经历经济改革和被政治边缘化的双重打击下，米雅尔反修正主义的不满情绪产生了。经历了几年的沉寂，米雅尔 1963 年在阿尔巴尼亚人的帮助下发表了一份小册子，名为《为胜利而斗争！沉默与被动意味着失败！》，这份小册子通过中国船只走私到波兰。^[8]此小册子在全波兰分发了一万份后，许多人被捕，米雅尔被解除所有政府职务并被开除党籍。^[9]1965 年 12 月，一本名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为社会主义而战！》的新小册子问世，并被在波兰公众间非法传播，它宣布“波兰共产党”成立了（或者说 CPP，也被称为波兰共产党（马列主义）或波兰共产党（米雅尔））。^[10]这个小册子引发了另一波逮捕，大约有 30 到 300 人被监禁（尽管有些材料显示大多数只是被拘留问话），^[11]证明这个新成立的党不仅仅是一个由阿尔巴尼亚人赞助的，只有一个人的存在于纸面上的组织，而是足以引发波兰当局关注的一个大团体。

米雅尔和他的同志们毫不掩饰地宣称，他们认为“东方”才是真正的“红色”的。党的文献说：“革命的中心已经东移……中国、印尼、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政党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12]毛泽东被称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杰出的理论家”，并认为波兰必须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3]然而，除了来自地拉那的一些援助外，波兰共产党似乎是孤立无援的。事实上，中国对他们的波兰同志持续三年不闻不问。直到1968年8月，北京才承认了波兰共产党，《北京周报》陈述到：“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革命党要在革命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刻同最广大群众保持联系，并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波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波兰共产党员——在波兰共产党的旗帜下，决心建立一个永远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特别赞许波兰共产党只允许最具战斗性和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人入党，并让纳粹抵抗运动的老兵成为党的骨干。^[14]

在接下来两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周报》中对波兰共产党大加赞扬，毛也继续在外交场合接见米雅尔。^[15]波兰毛主义分子在北京得到的声援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国家媒体对波兰毛主义的报道比起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毛主义分子的报道多到不成比例——那些国家大多数都被忽略了。^[16]作为回报，波兰共产党在其报纸《红旗》^[17]上对中国的文化革命^[18]赞不绝口，并宣称它是适用于他们自己斗争的典范。在中国英文期刊有关东欧的读物文章时，中国人将波兰共产党视为他们在东欧集团中仅次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兄弟党。

在分析波兰社会时，波兰共产党采用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即他们强

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是苏联集团内其他毛主义组织所不具备的。这种民族主义有时表现为公开的反犹主义，该党出版了诸如《犹太复国主义者参与破坏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和《奉行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犹太人与波兰工人的斗争》等小册子。米雅尔随后宣称，他针对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所有犹太人，但言论如“这群犹太复国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一群犹太裔种族主义者，带着平等的面具，渴望建立一个以犹太人为主导的国家，统治三千万众波兰人民。”充满了 1967 年的“波兰共产党纲领”，这让他的辩护言论有些难以相信。^[19]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一向反对反犹主义，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放在民族主义之前，为什么他们没有批评这一点呢？

可悲的是，对波兰共产党来说，随着 1976 年毛的去世，来自北京的鼎力支持开始瓦解。有趣的是，米雅尔继续支持毛的接班人华国锋和邓小平。^[20]这极大地激怒他的阿尔巴尼亚朋友们，在 1977 年他因继续支持北京而被逐出阿尔巴尼亚，这导致了他在 1983 年回到波兰之前平静而不活跃的流亡生活。回到波兰后，他试图重新开始政治工作，在 1984 年 11 月因散发反对国家的小册子而被捕。三个月后，日渐缩小的波兰共产党解散。^[21]尽管在 1997 年，米雅尔试图以左派民族主义为基础上重建波兰共产党，但这一举措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在此之后，米雅尔退出了政治的激流，成为一名记者，直到 2010 年去世，享年 99 岁。在经历了一段混乱、有争议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后，卡齐米日·米雅尔被安葬在华沙福音归正墓地。^[22]

注释：

[1] 原文请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十月），《毛泽东选集》（北京：外语出版社，1965），2：198。

[2] 原文请看《卡齐米日·米雅尔（1910年9月15日-2010年1月28日）》，作者为 Paul Saba 和 Sam Richards，刊载于网站“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s”网址为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rol/poland/poland-intro.pdf>

[3] 卡齐米日·米雅尔：死硬的教条主义者还是政治投机者？》自由欧洲电台，慕尼黑：RFE，1976年6月26日

[4] 同‘3’

[5] 波兰简史》作者为 Hubert Zawadzki 和 Jerzy Lukowski（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295-296 页

[6] 卡齐米日·米雅尔：死硬的教条主义者还是政治投机者？》

[7] 同‘5’

[8] 同‘9’

[9] Saba and Richards, 3

[10] 《波兰的‘亲中’派》，自由欧洲电台，慕尼黑：RFE，1964年6月20日

[11] 同上

[12] 《卡齐米日·米雅尔：死硬的教条主义者还是政治投机者？》

[13] 同上

[14] 《波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北京周报》11，no.35（1968年8月30日）：15）

[15] 《波兰共产党代表结束访华》（《北京周报》11，no.47（1969年11月21日）：3）和《关于卡齐米日·米雅尔在北京“访问”的紧急通知》（《北京周报》11，no.35（1968年8月30日）：15）

[16]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大胜利激励了波兰的工人阶级》（《北京周报》11，no.42（1968年10月18日）：18）

[17] 《来自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卡齐米日·米雅尔的问候》（《北京周报》12，no.21（1969年

11 月 21 日) : 28)

^[18] Saba and Richards, 4

^[19] 同 2

^[20] Kazimierz Mijal 《三个世界理论的重要性》 (《北京周报》 20, no. 51 (1977 年 12 月 16 日) : 17-18)

^[21] Michael T. Kaufman 《Arrest In Poland Hints At Party Split》 New York Times(New York, NY), Nov.19, 1984, A3.

^[22] Saba and Richards, 7

结论：对历史和东欧马克思主义单一的神话的质疑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至约瑟夫·布洛赫的信》，摘自《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2）第 294 页

在考察了毛主义在六个国家的历史及它们与毛主义在全球 60 年代的广泛联系以及冷战期间苏东阵营内对异议倾向的主流理解后，情况如何呢？

我这项研究的几乎所有发现都是源自主流文献的边缘：在政府的声明或文件中，在汇编文本中，在有关苏联或中国的更广泛的历史的文本的小段落中，在最新发表的期刊文献中以及一些尚未翻译成英文的作品中。尽管如此，这些文件像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当苏联和东欧的一些人听到了中国歌曲“东方红”后，看着他们周围的环境，问道“哪个‘东方’才是‘红色的’？苏东集团的东方还是东亚？”尽管东欧集团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只能勉强维持一种被动的生活，完全避开政治，但仍有少数人，受到经济改革和激进的共产党员被边缘化这两个现象的刺激，采取了坚定、明确的立场来表明他们所在的“东方”并不是红色的。

东欧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是统一的。尽管大多数情况下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在执政党的路线引导下进行的，但仍有很大的空间让集团内所有国家的学者去遵循其他的解释和总结。为什么这种情况在西方学术界没有得到更广泛的讨论？

想要听到毛主义故事中主人公的声音当然很困难。许多档案继续对学者关闭，参与这些事件的大多数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过着平静、谨慎的暮年生活，没有参与政治活动或历史保存。不过，正如我在讨论苏联的反修正主义时所说的那样，有一些学术研究正在展开。由斯洛波迪安（Slobodian）和塔卡克斯（Takacs）等学者撰写的长篇新文章表明，对东欧毛主义的英文报道正开始慢慢传播开来。德国和俄罗斯的学者开始编撰与这些运动有关的文献和期刊，并将它们上传到网络上，通晓他们语言的人可以很轻松的获取这些信息。

然而，这个过程的速度需要加快。必须有更多的学者愿意编纂这些作品和文件并将其翻译成英文，这些努力必须协调起来，以形成更连贯的史学。关于苏联和苏东集团的异见，西方主流学术话语几乎全部集中在主张通过亲西方，用自由民主的观点来解决社会弊病的意见观点上。普通大众可以接触到的历史是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故事。而那些经常失去自由和生计、以共产主义理论反对各自国家政权而艰苦奋斗的人的历史在哪里？通过发布那些在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异见人士的新历史，我们可以更好理解这些国家在跨国层面上展开的社会运动的细微差别，以及这些国家的人们是如何在一个激动人心、充满活力的历史时刻、理解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